

莫让“路条”再成光伏行业拦路虎

杨绍功

新年伊始,国家能源局2015年工作会上传出的消息给光伏行业带来新气息——今年不再对新装机容量设定具体发展目标和额度,这也意味着发展光伏电站项目将没有配额限制。许多业内人士希望光伏项目“路条”从此成为历史。

然而,“路条”的实质是对资源开发权的分配,如果行政审批改革不到位,条块分割的地方利益不理顺,资源市场化分配机制无法确立,“路条”仍将成为光伏行业发展的拦路虎。

长期以来光伏项目建设要过两道坎——获得省级有关部门同意可以拿到“小路条”,由省里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获批可拿到“大路条”。2004年国务院实施投资体制改革时就明确,对不使用政府资金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然而,核准和备案制仍然是“弱审批”,其背后依然是相关部门主导的资源开发权分配。

尽管2013年,光伏电站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让“小路条”成为历史,但资源分配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家能源局每年制订光伏电站装机容量指标下放给各省区,各省区再将指标分解到企业并对此进行备案,这严重限制了企业跨区域获取项目建设资质。于是“路条”倒卖近几年愈演愈烈,甚至出现部分“黄牛”企业专门以倒卖“路条”为生。审批改革不到位直接导致“路条”倒卖泛滥。

去年8月光伏行业巨头英利能源和天合光能在云南展开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路条”争夺战。最终天合光能以2.4亿元的“天价”获得了红河州建水县一个300兆瓦的光伏电站项目建设资质。这一“路条”的成本达到每瓦0.9元,远超业内每瓦0.3元至0.5元的平均水平。尽管天合光能被认为资金雄厚,但这意味着该项目必须进行苛刻的成本控制,甚至公司需要以其他收益来填补建设的亏空。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像天合一样承担高昂的建设成本,有的光



伏电站的建设方为了消化成本,可能会在工程上偷工减料,最终导致电站质量无法得到保证,有不少电站刚刚投入运营就问题频发。

因此,业内打击“路条”倒卖的呼声由来已久,国家能源局也于去年连发三个文件禁止“路条”买卖,要求对投资主体发生重大变化的光伏电站项目进行重新备案。然而,这三道禁令是以更繁琐的审核程序来消除计划性分配带

来的乱象,无法遏制条块分割的地方保护主义,其结果是不但无法治本,就连治标都很难。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企业进行跨区域的项目建设,就需要通过各种合法甚至非法的手段从当地企业手中获得项目建设资质。

在部分地区,地方利益也是“路条”倒卖的幕后推手。西部光照资源丰富的省份是光伏企业争夺的焦点,各地尚未统一的审核、备案管理和各种目标规划,背后都可能存

政府之手压住市场之手,助推“路条”倒卖变现。“路条”的本质是封闭的计划分配,倒卖“路条”是企业适应扭曲的资源分配机制的结果。其实,部分企业购买“天价路条”就是为了进入地方市场,在未来的资源开发权分配中分得一杯羹。

由于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连年未能完成预定指标,2015年国家能源局不定指标和配额,只是要求地方细化发展目标。从指标到目标,业界认为国家能源局将更依赖补贴来调控光伏电站的建设节奏,并将发展的重心向分布式光伏电站倾斜。支持分布式电站确实有利于遏制“路条”倒卖,因为集中式地面光伏电站项目的利润较高,“路条”倒卖乱象主要发生那里。但仅取消建设配额并不能杜绝“路条”乱象,因为即便实行简化了流程的备案制也仍有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国家能源局宣布近期将出台《关于能源简政放权配套措施的若干意见》,以确保放权能放得下、接得住、落得实、管得好。

退一步来说,在地方资源开发利益无法理顺的现状下,“路条”以企业能够承受的价格进行公开透明交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市场化资源分配手段,国际上也有以“路条”方式进行资源开发权分配的先例。有资质、有实力的企业根据自身需求,通过公开竞拍获得项目建设资格,只要能保证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应当考虑予以支持和鼓励。这样“路条”也就成为了真正意义的项目“通行证”,而不是拦路虎。

在深化改革和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新能源领域的建设和管理面临新的需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需要管理部门从审批式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变,从顶层设计出发规范和简化以光伏电站为代表的新能源项目建设流程,以负面清单倒逼地方打破区域限制,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才能根除那些“劫道”的“路条”。



升级乳业产业链才能避免下一次倒奶悲剧

郁慕湛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提下,商品价格受供需影响波动十分正常,受国际市场的冲击更是不可避免。单纯依靠政府出台政策进行扶持帮助,短期或许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说,依靠政策保护来实现行业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乳业困局。

在全球奶价疲弱的背景下,低价进口乳制品正在不断冲击国内市场。从2014年1月份到2014年10月,新西兰进口奶粉价格从42000元/吨跌到21000元/吨,还原成牛奶后的成本约在2.2元至2.5元/公斤,远远低于目前国内3.5元到4.5元/公斤的原奶收购价。

由于饲养成本高企,奶企限收甚至停收生鲜乳,青海、河北、山东、广东等地频发散户奶农倒奶杀牛事件。虽然日前河南新乡畜牧局辟谣称,此前的倒奶图片为奶农情绪激动,配合记者拍照所致,但是,其背后奶农们正在遭遇的危机却是事实存在。

其实早在2011年6月,一些乳企以“卫生不达标”为由拒绝收购散户手工挤奶,吉林长春等地就出现过倒奶卖牛现象。而2012年以来,由于奶牛散养户大量退出,但是规模化牧场未能填补缺口,全国奶牛存栏量大幅减少,“奶荒”严重,原奶收购价格直线攀升。至2014年初,生鲜乳平均价格攀升到每公斤4.27元左右,达近年来的最高点。而反过来,新西兰因恒天然天然毒素杆菌乌龙事件,价格下跌,进口奶在中国价格低于中国原奶。

对此,业界称中国乳业目前出现的不是“奶荒”,而是不断出现“奶冕”。因此,业界呼吁政府要出台对奶农、对中国乳业的保护措施,不要让中国奶农倒下,不要让中国乳业倒下。

中国乳业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的确需要政策支持,也需要政府出台一些保护措施。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提下,商品价格受供需影响波动十分正常,受国际市场的冲击更是不可避免。单纯依靠政府出台政策进行扶持帮助,短期或许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说,依靠政策保护来实现行业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乳业困局。

目前大部分乳业企业仍以收购分散奶农原奶的方式,相对于国外全产业链的乳品生产模式显得十分原始。而且,由于乳企处于过分强势的地位而常被诟病。乳企可以以原奶的质量问题而凌驾于奶农之上。这样的原始生产方式已经无法应对日益开放的奶业市场挑战。过去国外进口乳制品的渠道有限,而目前国外奶源进入中国的渠道已经日益多元化。因此中国的原奶必须面对国外乳制品的冲击。

乳企对于奶农,最大的问题是质量和价格,而奶农对乳企最大的问题是价格和成本。两方面的问题看似矛盾,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整合升级产业链得以解决。目前应当推动的是,将乳业厂商和散户的关系从对立转为合作,使其成为同一产业链上密不可分的一环。积极扶持奶牛大户、联户经营、家庭牧场等经营主体,扶持奶农合作社发展,提高奶农组织化程度和整体竞争力,养殖场规模化之后,不仅仅有利于降低原奶的供应成本,还能够增加奶农

与乳业之间的议价能力。

此外,通过乳企与奶农双方互相的深入参与,乳企能够进入奶农的生产全过程,则能够掌握奶农的生产标准,这对于解决中国乳业长久以来的安全问题同样帮助巨大;而奶农与乳企形成合作,则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这在国外的合作农场是屡见不鲜的,而这也几乎是提高目前中国散户奶农集约化生产水平的唯一途径。

提高员工福利这个应该有

环球

1月12日,《2014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大中城市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为66.5,处于“基础水平”。而对于员工提升福利保障水平的需求,仅有47.5%的企业表示愿意增加员工福利保障投入,更多企业的态度是“保持不变”、“不会”或避而不谈。(《工人日报》1月13日)

在2012年,我国就首次通过指数化方式,对企业员工福利保障状况进行系统测量和调研,当年我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为65.37,处于基础水平。可见,我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的提升速度,与社会发展、职工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据说,有关部门将福利保障水平分为五档:低层次水平、较低层次水平、基础水平、较完善水平和完善水平。从两年的测量和调研结果看,我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已处于第三档,即基础水平,离较完善水平只有“一步之遥”,表面看还算不错的成绩。但是,66.5和65.37这两个“大数据”掩盖了多少“细问题”,这两个“平均数”能不能代表“大多数”?

事实上,企业员工的福利保障水平,行业、企业差异一直十分明显。根据两年调查结果,从行业看,“金融/银行/保险”行业员工的福利保障指数最高,而“加工制造/仪表设备”行业员工的福利保障情况最差。从企业看,国有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情况最好,外企次之,民企最差。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测量与调研,不知道调查面有多宽、范围有多广,结论会不会有失偏颇?

另外,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水平的公平性也常被质疑。在不同类型企业间,央企的高工资屡遭网友“羡慕嫉妒恨”,央企的好福利也频让网友感慨。即使在同一企业,正式职工与劳务派遣职工不仅同工不同酬,福利也有差别;国企普通员工与管理层的工资与福利待遇也悬殊颇大。

因此,面对企业员工福利保障处于基础水平的调研结论,千万不要认为成绩不错。有关部门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要调整工资分配差距,而且要缩小不同类型企业和行业中员工福利保障水平的明显差异,减少福利保障中的不公平问题。而对于福利保障动力不足的企业,相关部门则应运用优惠、减税等手段,鼓励引导企业不断提高职工的福利保障水平。

舌尖上的安全不能总让媒体推着走

商意盈 马剑



杭州知名火锅店如老码头、川味观、渝香隆等近日相继曝光:回收剩菜、高汤作假、修改食品保质期……企业将利益置于安全与信誉之上的行为再次绷紧了消费者的神经。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问题胶囊”“福喜”在内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其曝光的模式也大致相同:媒体冲锋在前,一抓一个准;行政执法部门随后跟进“突击检查”,该抓的抓,该罚的罚。

舆论监督固然重要,但作为食品安全的主管部门,不能总是等着媒体曝光才进行查处,日常监督也应该发现一些大要案。食品药品安全关乎百姓健康与性命,监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状况下,政府部门的监管尤其重要。

要让日常监管硬起来,改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状况,部门行政执法可以多一些、再有力一些,并且应该向社会公开。

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和作风,将监管工作落实到基层;其次是要厘清部门责任,加强监管力量,提升监管能力,从源头上封堵漏洞。另外,还要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对生产经营者的外部约束。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结构问题

王宇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关于其成因和对策的讨论仍有较大分歧。有人认为,



这是一个总量问题,应通过加大刺激力度来解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讨论关系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关系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需要辨析清楚,形成共识。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在很多国家都曾长期存在,最近在我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经济问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这些问题的集中反映。

近年来,我国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流动性整体充裕。在货币信贷规模方面,2014年11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20.86万亿元;2014年1—11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9.08万亿元,远高于从2003年到2013年11年间平均每年新增人民币贷款5.56万亿元的水平。在资金价格方面,2014年9月,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7.33%,低于2008年同期的8.19%。因此,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不是总量问题。推高企业融资成本,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结构问题,它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体制、产业、企业和金融等方面。

构通常会采取提高风险溢价的办法来覆盖潜在损失。

可见,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结构问题,是经济转型中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的集中表现。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刺激力度会适得其反,而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样,才能解决体制性矛盾、消除结构性扭曲。一是完善产权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财务硬约束。二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财税制度改革,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力度。三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调节流动性水平,盘活存量,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四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一方面,打破金融垄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另一方面,发展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推出更多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工具。

从根本上讲,产权明晰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优胜劣汰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要义。通过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硬化预算约束,淘汰落后企业,出清过剩产能,消除金融抑制、打破金融垄断,使资源从效率较低的地方流向效率较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国家实业发达、市场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本之策。